

Mémoires

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 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回忆录 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Raymond Aron

[法] 雷蒙·阿隆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Mémoires

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

雷蒙·阿隆回忆录

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Raymond Aron

[法] 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法)阿隆著;

杨祖功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

ISBN 7-80225-103-6

I.雷... II.①阿... ②杨... III.①阿隆,R.一回忆录②政治—评论—世界

IV.①K835.657=7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039 号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法)雷蒙·阿隆/著 杨祖功等/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3.75 字数:800千

版次:2006年9月第一版 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6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译者前言

《雷蒙·阿隆回忆录——50年的政治反思》(中译本)再版了,摆在读者面前的新书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更加精美。如果能邀请作者为新版写个序或前言当然最好,可惜作者早已作古。为了便于广大中国读者阅读,只好由译者对阿隆其人、其书以及中译本的翻译出版过程作个介绍和交代。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尽心尽力支持和促成本书出版和再版的前辈、朋友以及热心的读者们表示谢意。

一 中译本缘起

2005年3月14日是雷蒙·阿隆100周年诞辰,法国知识界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中国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冬去春来,突然接到严搏非先生从上海打到舍下的电话,称读过此书,认为很有意义,欲推荐再版。我们不谋而合,当即欣然达成协议。这也算是对阿隆诞生101年和逝世23年的一个不期而遇的纪念吧!

回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偶然得到了1983年出版的《阿隆回忆录》法文原著。初读之后,立即被其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激烈的学术辩论震撼了。其时,原《大公报》(现《经济日报》)国际部主任、国际问题研究的前辈张契尼先生刚到社科院欧洲所,凭借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学术嗅觉,力促我们几个搞法语的把这本书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外交学院任教的孟鞠如教授早年曾常驻法国,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自告奋勇承担了部分翻译任务,并愿意不署名地为部分青年译者校稿。于是,我率领一伙青年人齐心协力投入了这项在当时算是浩大的翻译工程。与此同时,张契尼先生向北京三联书店总编室领导戴文葆先生大力推荐此书。上海复旦大学的余开祥教授是戴先生的同窗和我们的好友,也积极促成此事。戴总编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把出版这本大部头译作当作一项重点项目来抓。后来他又当面托付即将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职务的沈昌文

先生,让他不管困难多大也要出版,而且印数要尽可能多一些。沈昌文先生既积极又谨慎,在筹措出版费用和审校书稿上付出了不少心血。法国驻华公使、后晋升为大使的马腾(Claude Martin)闻讯也赶来向译者和出版社表示感谢,并将阿隆的另一部作品(《负责任的观察家》)送给译者。几经周折,经过各方努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中译本初版终于在1992年6月付梓问世了。

我旧事重提,就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这个中译本着实来之不易。当时我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对西方学术思想著作的介绍和引进仍举步维艰,远未形成后来的“拿来主义”高潮,更谈不上学术普及。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西方学者特别是像阿隆这样的自由主义右派学者的作品还比较生疏。引进阿隆的著作称不上什么“冲破坚冰”,但出版一部观点有争议、块头又较大的作品,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勇气。如果没有出版界前辈和朋友们的真知和远见,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和促成,中国读者要看到这个完整的译本,恐怕尚需等待多日(他的另一部名著《知识分子的鸦片》,直到2005年才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

阿隆的一生,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法国人民阵线、维希伪政权、反法西斯斗争、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法德和解、1968年五月运动、冷战和美苏争霸、越南战争、核威胁、欧洲联合、社会党重新执政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他对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他身边和他身上的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反思。这是一位学者对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真实地演绎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曲折心路历程。阿隆是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对这个动荡世纪的政治反思和哲学思考,不仅对法国和西方思想界富有深刻的教益,对中国读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译本的出版在中国和法国都引起很大反响。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曾先后出现过“萨特热”(Jean-Paul Sartre)或“存在主义热”,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的“萨特时代”。但出于各种原因,人们对阿隆的了解却相对较少。阿隆开始被中国学界关注,主要是因为他是萨特少年时期的同班好友,后来又变成势不两立的论敌。通过这本回忆录,人们开始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到法国还有另一位可以同萨特比肩的哲学家、思想家。这两位大师,一个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旗手,另一个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们在法国学术界、舆论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法国近半个世纪的思想发展和社会运动产生过深远影响。继这本回忆录之后,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阿隆的著作和思想逐步引起了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浓厚兴趣,介绍和评论阿隆的文章和著作也日渐增多了。2005年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还举行了同时纪念阿隆与萨特百年诞辰的国际研讨会。

顺便提及,当本书的几个青年译者先后赴法留学或工作时,翻译阿隆回忆录

的这段学术经历几乎成了他们进入学术殿堂或“考研”的推荐函,得到不少法国知名教授、学者的青睐和款待。几年前,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先生曾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事后,他悄悄地对陪同者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看到这部厚重的阿隆回忆录早已译成中文出版了。

二 阿隆其人

先讲一个近似笑话的插曲。当年我们路遇出版社总编室的某个编辑(当然不是这本回忆录的责编),顺便打听:“《阿隆回忆录》发排了吗?”他回答说:“阿兰·德龙回忆录呀?快了!”国人对法国学者缺乏了解可见一斑。那时候,中国人知道最多的是法国历史名人拿破仑、戴高乐,青年人则只认识法国足球明星普拉蒂尼,这倒不足为奇。据法国朋友说,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大致如此。他们对孔夫子耳熟能详,对现代中国包括鲁迅这样的大作家,却知之甚少。

雷蒙·阿隆(Raymond-Claude-Ferdinand Aron),别用名热内·阿沃尔(René Avord),生于1905年3月14日,卒于1983年10月17日,出身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与号称法国“社会学之父”的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有亲戚关系。他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一生博学多能,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中都有所建树。他是一位著名政论家,尤其精通经济、国际关系和军事问题,曾先后主持过《战斗报》、《费加罗报》和《快报》周刊的笔政。他桃李满天下,亨利·基辛格博士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他发表了上百部作品,曾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入选为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被世界上十几个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授予荣誉院士和博士称号。

按照法国的习惯划分,阿隆当属于右派。作为右派知识分子,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在学术问题和国内政治上,他与左派知识界激烈争论和对决。他反对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运动,有保留地支持传统右派政府。有人把他看作“理性的知识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旗帜”;也有人说他是“技术官僚的象征”,指责他扮演了“罪行的旁观者角色”。在国际问题上,他积极主张与德国和解、与美国结盟,激烈批评苏联,被一些人指责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的辩护士”。

其实,阿隆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形成和发是很复杂的,与他经历的时代和个人实践密切相关,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左右概念来界定。他少年时代曾受到当时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学时期又自认为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阿隆继承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19世纪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193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攻读哲学和社会学时又深受胡塞尔和韦伯的影响。他强调理性是解释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手段,人类要维持生存,只能靠理性与科学。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工业社会的最好制度,尽管这种社会制度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和“自我毁灭”的趋向。阿隆的历史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早在他的博士论文^①中已初见端倪。他的历史哲学观是:历史是自由的,历史的发展从整体上来讲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是一系列制约,人只能在这些制约中发挥其作用。他的政治哲学观是:首先要作出根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本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政治行动。他目睹了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并亲耳听了希特勒的演说,这一切使他的历史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提出,“要超越历史,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了解过去是为了从过去中解脱自己”。他认为“自由应该是一种逐步的解放”,“狂热是怀疑的终极表现”。他主张“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坚决反对采取任何暴力和革命形式。

阿隆属于自由派,但他对“自由”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在法国自由派学者中,他与哈耶克相识较早,也认同“法治社会”建立在“开明的私利”之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但他并不推崇哈耶克的绝对自由社会原则,也不同意“市场原教旨主义”。他结合法国的传统和实际,主张要关注全体国民的自由、安宁与幸福,建立一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强调民主社会的“现实性”和“平庸性”。

当他自称要做个“负责任的观察家”时,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要“躲到象牙塔里”冷眼观察世界。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曾研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他不是一般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同意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用他的历史相对论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直到晚年,他仍宣称:“至今我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仍饶有兴味。”^②后人还为他结集出版过《阿隆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刻,阿隆不禁唏嘘,他们这一代人的政治生活过于严肃和带有悲剧色彩了,政治分歧影响了他与萨特、马尔罗(André Malraux,戴高乐政府部长、作家)的友谊。他哀叹:“今日的政治家们缺乏悲剧意识”,“但愿政治分析能告别一切感伤”。

三 阿隆与萨特

1926年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有两个年轻的法国人在圣日耳曼大道上漫步。他们是自己一代最杰出的、也是最丑陋的两个人。他们暗下决心,要弥补

① 参见《历史哲学导论》,加利马出版社1938年版。

② 参见《负责任的观察家》,朱利亚尔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他们外貌上的缺陷,唯一的途径是在智力上出人头地。其中稍高的一个对于自己的前途毫不怀疑,他夸口说:“不出8年,我就很容易地和黑格尔的成就并驾齐驱。”他的伙伴忍不住暗笑。后来的结果是,这两个狂妄的年轻学者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半个世纪以来,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主宰着法国的知识界,不但如此,他们各自都成了法国思潮的象征和代表。

这是三联书店的编辑为发表《阿隆回忆录》(摘译)(载于1984年8月出版的《海外书稿》创刊号)时写的导语,非常生动,特转录如上。

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法国知识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特别是其中两个代表人物——他与萨特的分歧与论战。转眼间,萨特和阿隆先后离开人世已分别有26年和23年了。萨特逝世后,民众自发地举行了大规模的隆重葬礼,显示了他在民间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受到拥戴和享有厚望。阿隆逝世后,法国官方和世界精英对之好评如潮。密特朗总统称他是“主张对话、信仰坚定和学养深厚的人”。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甚至,法国一家左派报纸《解放报》也用了这样的标题:“法国失去自己的教师”。但直到如今,后人对他们个人的评价似乎仍未“盖棺定论”,围绕他们之间争论的争论,似乎也没有终结。

阿隆与萨特是两个同龄人,他们都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博大精深的学者,但他们的立场、观点、人生哲学和思想风格却迥然不同。当两个青年才俊还亲昵地用“小同学”相互称呼时,阿隆曾说过:“我羡慕萨特的自信,我在内心深处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对阿隆的评论则是:“阿隆似乎是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永远保持一段历史距离的人。”两人的友谊自1947年(双方均已进入不惑之年)开始破裂。随后在法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们的关系形同水火,各自成了不同派别、不同思潮、不同阵营的代言人。萨特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支持并亲身投入各种社会和文化运动。阿隆则自觉地充当“负责任的旁观者”和“沉默大多数”的代言人。两人之间的论战连绵不断长达30多年。在这风起云涌的30多年间,萨特活跃于各种社会运动和文化沙龙之中,有时直接走上街头。他的思想在法国左派知识界乃至欧洲思想界都有巨大影响,几乎达到一呼百应的地步。阿隆则致力于著书立说、教学授业和撰写评论,同时密切关注着萨特的一举一动,以其右派的理性抗争着左派的激情。直到1980年4月萨特谢世,阿隆才真正站到历史的前台。“你方唱罢我登场”,阿隆的思想开始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影响逐渐超过了萨特。

萨特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从1945年就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他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支持1968年的法国学生和工人运动,自

己也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运动。他激烈批判西方社会制度,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鼓与呼,甚至为其缺点错误进行公开辩解,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还以“不接受任何官方的荣誉”和“不愿被体制化”为由,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阿隆则较为谨慎和严谨,坚持理性。他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但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没有成为“戴高乐或德斯坦的基辛格”。从1955年发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起,他就不断地批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幻想”。他指责萨特“否定现实,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一味肯定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特权和革命理想。他反对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与政府站在一起号召学生回到教室去。他痛批萨特和左倾主义,认为法国左派只“专注于决裂和摒弃”,而他代表的右派则扎根于历史,继承了历史的遗产。他严厉批判苏联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极力维护西方民主社会原则,并积极支持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政策。

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是:“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他坚持认为,对历史的感知只能是个别的,每个人都是被客观化和被异化的。要摆脱异化和创造新人类,唯一的方式就是革命行动。阿隆则认为,“自由应该是一种逐步的解放”,“解脱来自于摆脱了幼稚幻想的意识”。阿隆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理智的选择要求他将现存制度与革命者将要实行或预见的制度相比较”,阿隆警告说,“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真理和绝对真理,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阿隆批评萨特“要么完全自由,要么没有自由”的绝对自由主张,指出:“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一个人的过去限定了他的创造力能够发挥的范围。”阿隆还认为,从本质上讲,存在主义不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个体的主观与历史的客观、个体的实践与集体的行动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但这种关联不能被简单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掘可能发掘的因素,重构这种关联的骨架及其丰满的历史肌体”。

如何看待阿隆与萨特之间分歧与争论呢?法文有一句成语“*tout ou rien*”,意思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不存在非此即彼、全对和全错的情况。我们对他们也不能采取要么全盘肯定(接受),要么全盘否定(拒绝)的态度。况且,有些学术争论,如他们对历史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争论,恐怕永远没有最终的结论。其实,世界在变化,他们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对他们的看法不能一成不变。他们在法国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法国国内和世界许多重要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也不相同,大多针锋相对。在两个阵营对立、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他们对美国、苏联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是坚持“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大知识分子。在1979年支持越南难民的反美集会上,两个冤家对头

的双手也曾重新握在一起。事后来看,哪个人都不能说一贯正确或一贯错误,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判断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在当今的法国,萨特思想的影响似乎有所削弱,阿隆思想再次占了上风。青年人逐渐回归理性。但仍不时发生像 2006 年春反对“初次就业法”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在中国,萨特头上的光环也逐渐失去了亮色,存在主义已不再是青年人推崇的思想时尚。而阿隆提出的“将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现实”和“真正的政治智慧是寻找一条相对较好的务实道路”,似乎受到更多青年人的欣赏。

20 世纪是个疾风骤雨的时代,人类经受了种种战争和灾难的洗礼和磨炼,也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有益的实验。阿隆和萨特是 20 世纪的同龄人,他们伴随这个多灾多难又光辉灿烂的世纪走完了一生。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所走的学术道路也不一样,但都称得上是 20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法国和国际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理应得到我们的怀念、纪念和深入研究。

中译本根据法国 Julliard 出版社 1983 年初版全文译成,又据 Robert Laffont, S. A. 出版社 2003 年版校订。为便于中国读者了解对雷蒙·阿隆及其《回忆录》的最新评论,补充了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为新版撰写的序言。

最后要说明,三辉图书诸位同仁为本书的审读、修改、润色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杨祖功谨识

2006 年 4 月于京城芳草地陋室

序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茨维坦·托多罗夫

再回首,人们就会发现,雷蒙·阿隆(1905—1983)是法国 20 世纪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而这本《回忆录》则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更近乎于集知识和经验之大成的巨著。作为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从为日报撰写社论到出哲学文集,还写了历史研究专著和论战小册子。今天,他的主要论点已经被一切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士所接受。从他的正式传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的成就并非始于今日。他生前发表了 40 余本著作,同时定期为《战斗报》、《快报》周刊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撰写文章。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验学校 and 法兰西学院授课。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最高学府做过无数次学术报告。他得到过许多最富盛名的奖项和名誉博士称号。他会见过法国、欧洲和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他们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他是个思想得到公认的胜者。但这种表象容易让人误解,这不仅是因为,阿隆思想在形成时期并非主流,毋宁说反潮流的,是反对成见和约定俗成的。《回忆录》的细心读者还会发现,作者不仅分析精到,而且是一个随时准备怀疑一切、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人。他敢于揭自己的疮疤,袒露自己的忧虑和不足。因此,当人们看到其传记的杰出作者古拉·巴维雷兹提到“这个无限复杂的祸患灵魂”时^①,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更好地了解雷蒙·阿隆,仅仅归纳和概括一下他的理论是不够的,当然,

^① 参见巴维雷兹:《雷蒙·阿隆传》,弗拉马虹-尚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1 页。关于阿隆的另一部分丰富资料来自《评论》专刊(1985 年 2 月,第 28—29 期。)

无视他的理论也不对。必须抓住他个人的命运。思想的活力和人性的脆弱非但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重大选择

像阿隆一样,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年幼未能参加战争的 20 世纪的欧洲人,必须对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阿隆每次都坚定地选择了个人的立场。

他发现了纳粹主义,但不是从书本知识中发现的。因为,他从 1930 年 3 月到 1933 年 8 月在德国工作和学习,先在科隆,后到柏林。他目睹了民主制度的垮台和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危机。这些事件改变了他对政治生活的观察方式。阿隆与当时在法国青年知识份子中盛行的和平主义决裂了。他为不同报刊撰写文章,发出警告。他认为,希特勒的威胁已经暴露无遗。但那时,他还是个无名小辈,他的警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随后几年,他尝试着更好地了解这种新的政治秩序。他引进了“百年信仰”概念,这是后来因纳粹主义而被揭示出来的。战争初期在军队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但 1940 年 6 月还仅限于法国南方,指的是以伦敦为基地继续抵抗侵略者的法国人。他立即做出抉择,把妻子和孩子留在法国,于 6 月 23 日成功地登上驶往英国的船只。在英国,他参加了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经历了战争,直到 1941 年 9 月回到巴黎。

早在战前,阿隆就对共产主义持批评眼光。尽管 1942 年苏联人与西方人结成了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他还是对“这个超越地界的信仰”^①提出质疑。特别是战胜纳粹之后,当阿隆似乎感到好心得好报的时候,他又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意识形态的无情斗争。“铁幕”一词出现在他于 1945 年 7 月以后写的文章中。出于这个原因,1947 年他选择去《费加罗报》而不是去《世界报》当社论撰稿人,因为同情共产主义。出于同样原因,1950 年他成为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组织——“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委员中包括莱昂·勃鲁姆、达维·鲁塞尔、弗朗索瓦·莫里雅克和阿尔贝·加缪等人(由于有人揭露该组织的部分基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于是在 1966 年终止活动,但其成员始终没有减少自己的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的主张)。阿隆经常在这个组织的机关刊物《论证》上发表文章。1955 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其他著作,是研究苏联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70 年代中期,当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之际,他进一步揭示了法国左派抱有的持续幻想。因为在法国左派看来,只要为了崇高的理想,集中营也就显得不

^① 巴维雷兹的引语,见原书 210 页。

那么残酷了。诚然,阿隆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但至少,他是法国坚持时间最久和为伙伴提供的论据最有说服力的人。

殖民地问题往往不大引起阿隆的注意,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观点的连续性。他坚持认为,应该同法兰西民族保持团结,但赞成最好让殖民地独立。在伦敦时期,他支持放弃印度支那。当1946年越南起义爆发时,他不愿公开谴责投入战争的法国军队。但他看出了,法国政府声称的普世原则与平等原则同其实践存在一种矛盾。“用暴力来维持,不是维护法兰西。”(参见186页^①)他满怀激情地热爱他的国家,但这种热爱要求国家要忠实于自己的理念。1951年他重申自己的愿望:印度支那应该独立。至少,他后来不再经常发言支持政府的那种非殖民化政策。

他在1957年6月通过一本小册子真正介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悲剧》这本小册子后来产生了爆炸性效应。此时,法国已经有人为他辩护,称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他与别人不同,他支持的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而是支持他们提出的理由。他反对维持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意味着维持人类族群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与法国的理想背道而驰的。结果,维持殖民地统治几乎把他的国家引向内战。他不仅向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且向政府和议会里的政治家们补充了一条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经济理由:维持一个殖民地,尤其是在冲突期间,入不敷出,太得不偿失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阿隆并没有走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和号召新兵开小差的地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服从法律要高于顺从民意。

阿隆反对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因为他认定了自由民主制度。后者意味着在两种要求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尽管这种妥协往往是脆弱的。他主张把自主权交给个人,但国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些生存手段,帮助他们行使本应享有的权利。(参见第655页)一方面要有建立在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自由,另一面也要进行反对不平等的斗争。这种妥协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始终是不完善的。因此,不能只想着如何批判各种民主制度。即使出于留恋过去或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抱有幻想,这种批判也不能成立。人们是用民主理想本身来批判民主的。尽管阿隆从总体框架上接受和支持民主制度,但也指责他所生活的社会里,个人利益排斥总体利益,压力集团使国家瘫痪,公民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场辩论似乎永无止境。

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威胁是:他们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化身,企图用实力来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阿隆写道:“不能、也不应当用十字军东

^① 除非特别标明,引文一律参见本书,下同。

征的办法来推广自己的制度。”(参见第 527 页)让国际关系服从于国内原则,纯属一种危险的幻想。“人权不能成为一种政治”,这是他那本访谈录《负责任的观察家》^①一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在同样的背景下,阿隆对后来试图要建立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公正也表示怀疑,他说,“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庭。”纽伦堡法庭在这一点上不能成为反证。纳粹国家领导人首先被判有“反和平罪”,这是一个战胜国唯一有权判定的罪行。“谁赢了战争,谁就可以指定由败者对战争负责。”^②换句话说,所谓行使权利,就是实力为王。

为什么和怎样

上述就是阿隆的基本政治立场。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同代人之中,能够以这种选择而自豪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阿隆本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中学结束时他接触到哲学,哲学促使他采取了这种思考生存而不是忍受生存的立场。(参见第 15 页)然而,他是怎样摆脱知识分子陋习的?他受过什么高超的教育吗?他得到过哪个名师指点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出乎意料:他跨越了教育的几个决定性阶段,但并非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板凳上,而是在柏林的街道上。决定其政治方向的关键人物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因为 1932—1933 年期间,他亲身看到了纳粹在德国的崛起,是他自愿选择了这条罕见而艰难的道路:面对周围世界,不要闭起自己的眼睛,不要用幻想和抽象来代替现实,而要把亲身经验当作理论的试金石。阿隆留给后代最重要的教训是:拒绝把生活与思考割裂开来,始终把理念同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变的所扭曲的事实加以比照。他在生命走向终点时强调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独特的个人反应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参见第 630 页)

他也是在旅居德国的时候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行为方式。在那里,他不仅发现了非理性力量的强大和群体暴力,也发现了可以应对政治病的某些规则。规则之一来自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条规则就是:在公共行动领域中,少看行为人的意图,多看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另一条规则来自一次与某个法国政治家不期而遇的会见。有一次,阿隆到巴黎造访这位政治家,阿隆正在陈述德国日益增长的危险,他反诘道:你说得很在理,但具体一点,如果你坐在总理的位置上,你怎么办?阿隆回答:不要在意那些正当的怨恨,把自己放在行为人的位置上。不要仅以高尚原则的名义去批评他们。要想想有无可能性,不

① 朱利亚出版社 1981 年版;波莱斯—伯克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4 页。

② 巴维雷兹:《雷蒙·阿隆传》,第 299 页。

要一相情愿。不要被美丽的形式所陶醉,要让事实来检验这些形式。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这就是最好的教训,也正是阿隆寄居德国时得出的教训。

与此同时,他也从中找到了未来的研究对象。他不满足于纯粹的哲学思考,尽管他为此做了几年的研究准备。他更愿意认识和解读卷入历史运动的人和纷繁社会中的人。他漫步在莱茵河畔或施普雷河畔,想出了一个终生不渝的课题:《思考正在形成的大写历史》^①。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又成为他的楷模,甚或超过其他哲学家或学者。他把他的研究对象引入到正在前进中的历史——让世界震撼的历史。他懂得如何把持续和瞬间的含义连接在一起。(参见第59—60页)这次轮到阿隆自己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身边的世界了,成为倾听其声、关注其怒和探究其意的同代人了。

乍一看,生存与思索之间的连续性似乎存在一种悖论,因为阿隆曾反复地要求,不要把善与真混为一谈。他回首往事,指出在旅居德国发生思想转变之前的早期著作中,曾把两者搅在一起。而站在对事实进行明确分析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发现,这反映了作者的良好意愿。凡是想了解政治的人,都会对他的判断感到惊讶不已。他的判断是,要抓住本来面目的行为人,而不要让这些行为人适应自己的需要。阿隆于1937年写道,政客本身不应该是“讲人道的和仁慈的,而应该是勇敢的和严厉的”。^②发现和捍卫真理,需要勇气。他有勇气,而多数同代知识分子却缺乏勇气。阿隆从1933年就抓住了希特勒的威胁,1945年就看到了斯大林的危险。

当然,明确区分真与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掉其中一个观念或偏好另一个观念。恰恰相反,避免混淆真和善这两个观念,可以厘清二者的关系。阿隆的贡献在于,他批判了把两者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使其纳入到新的价值结构之中。在政治上,把“现实主义者”同“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后者只关心可望而不可及的,反对严谨的观察家;而观察家则满足于记录现状。现实主义者则超越这两种局限,他们在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之前,首先对世界进行精确的了解。现实主义行动反对屈从态度,即认为现实已经如愿了;也反对自我满足的幻想,即把愿望当成现实。现实主义者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乌托邦。同样,信念观也不反对责任观,但反对纯粹的实用主义,反对追求立竿见影。责任观本身需要有信念,需要了解客观情况。行动要取得成效,这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主张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负责任的政治,不是屈从政治或犬儒政治。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拒绝把这种理想

① 1965年的论文,转引自巴维雷兹茨:《雷蒙·阿隆传》,第338页。

② 同上书,第125页。

当作理解现实的一个工具。

阿隆本人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在《回忆录》中讲到,在德国,当纳粹分子夺取政权之时他就明确了自己面临的选择。一位德国大学的朋友决定倒向新潮,对他这样讲:“你将永远是个旁观者,一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你没有勇气参加将给群众和历史带来胜利的行动。阿隆接过来讲,他讲得有理”。(参见第63页)人们不会同意这个德国人的判断。阿隆旋即勇敢地参加了行动,无论是1940年还是1945年,抑或1957年。不错,除了投奔伦敦那一次,他参加的行动主要是在知识领域里,并非政治行动。而且,只要他能呼吸到学术独立的空气,就永远不会对等级制权力再感兴趣。历代著作家深得他的推崇,从修昔底德到韦伯,包括孟德斯鸠,他们都是追求了解世界胜于改造世界的伟人。这种选择注定将使阿隆处于某种孤独状态,远离了战友之间那种热烈的兄弟情谊。

同样,由于他没有明确地介入党派斗争,也就无须坚持这些党派的基本信念。但他可以对这些信念进行细致的分析。阿隆宣称,“我对社会深层力量的态度是明确的。我始终觉得自己被分割了,对事态的发展,无论远期发展和近期发展,都感到没有把握。”(参见第254页)当然,要想对世界有一个尽可能深刻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当作进行判断的必要前提,就不能不明确这一点:人与社会是异常复杂的,一些善意的意愿却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亦然)。尽管伟大的原则可以是坚定的和无可争辩的,但具体情况却很难符合善恶二元论的判断。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颜色。阿隆在《负责任的观察家》一书中写道:“永远没有善与恶之争,只有可取的与可憎的之间的斗争。”

因此,探索知识的研究工作绝不会是封闭的。对人类世界的阐释一定是多样化的,是相互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阿隆从来没有自诩掌握了最终真理和完整的阐释体系。因此,他提出的判断不是说一不二,而是留有可供争论的余地。1940年,他在伦敦为《自由法兰西》(一份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的法国人办的杂志)撰写社论时,一方面对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鲜明的立场,同时申明,杂志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和尊重各种信仰”。^① 1955年,他为《知识分子的鸦片》^②这本论战小册子作序时,描述他的思想伙伴是“懂得战斗但不要仇恨”的人。他对一些敏感问题,如停火与合作,维希与贝当,也提出了巧妙而平衡的判断。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要求残酷清洗的思想。萨特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怒气冲冲,与之相比,阿隆在《回忆录》中对萨特的描绘则显得宽宏大度。阿隆对其他昔日论敌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倾向于,要始终从好的方面看待他所批评的思想,也从缺点

① 转引自巴维雷兹:《雷蒙·阿隆传》,第173页。

② 阿歇特—布吕尔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方面看待他为之辩护的思想,这种倾向性遭到盟友的激烈批评。说他难以预料,犹豫不决,每次肯定什么又加上许多限定词,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坚持什么。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不禁怀疑起来,他是不是过于反对恶善二元论了……

但实际并非如此。阿隆摆脱了恶善二元论和相对论的羁绊。恶善混合说虽然曾滥觞一时,但并不妨碍他明确指出什么是世纪的恶。他于1956年写道,“真理不会始终是恰到好处的。20世纪专制暴行就是无度的。”(参见第310页)阿隆对恶进行谴责,毫不含糊;对善的前景则没有把握。

边缘化的阿隆

今天,阿隆的思想已经得到公认,同代的几位思想大家对他倍加赞赏。但这可能误导我们,以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共同舆论的代言人。其实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一个如此关切真理的人物,不可能长久地适应每个政党和每个机构的口味。阿隆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为自己的知识选择付出了代价,尽管他身上罩满了各种荣誉头衔。卢梭深谙其中奥妙,他曾指出,“任何党派人士,仅凭这一点,就会成为真理的敌人……”^①阿隆对此也有自知之明,1965年的这幅自画像就是证明:“怪人一个,过分关心行为中的真理,过分关心思想中的行为。(……)这就是我,许久以来,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意见不是冲击这个就是顶撞那个,尽管他想竭力保持温和,仍然令人难以容纳。”^②

阿隆首先是一个始终被政权边缘化的人。有人可能以为他是君主的顾问,因为他与第五共和国的各位总统如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他与第四共和国的政界人物也很熟。但他从来没有当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官方顾问或半官方顾问。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为权力效劳都是可耻的,他莽撞地坚持其独立性。对各个政党的态度也是如此。1926年—1927年,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加入了社会党。但自从他在德国发生思想转变以后,这种党派归属就不再延续了。在伦敦,从1940年起,他本来可能变成戴高乐派,但围绕在将军身边的个人崇拜和强迫追随者看待世界非白即黑的做法把他激怒了。于是,他与之拉开了距离。“解放”^③以后,当戴高乐成为政府首脑时,他继续持保留态度。而一旦戴高乐远离政权,阿隆便决定向他表示忠诚,加入了 he 创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1948年—1952年,他多少有点勉为

① 《卢梭全集》,加利马-七星出版社1964年版,第1卷,第965页。

② 转引自巴维雷兹:《雷蒙·阿隆传》,第338—339页。

③ 即二战胜利。——译注